

试论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以 1941 年 法胡德事件为中心

杨玉龙*

内容提要 法胡德事件是 1941 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爆发的反犹主义暴力事件，其产生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纳粹德国在伊拉克的反犹主义宣传，英国在中东对犹政策的改变，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民族冲突问题的外溢影响。从国内视角分析，伊拉克国家政治动荡、国家对犹政策转向，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是主要内部根源。法胡德事件对伊拉克犹太人历史具有转折性意义，引起了犹太人群体的安全焦虑，引发了规模性的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该事件改变了伊拉克犹太社群与巴勒斯坦伊舒夫的关系，使后者逐步调整了对东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政策，伊舒夫进而积极介入和动员中东阿拉伯国家犹太人阿里亚运动。最后，该事件还动摇了犹太社群对伊拉克国家的认同观念。

关键词 法胡德 伊拉克犹太人 阿里亚运动

东方犹太人^① (Oriental Jews or Mizrahi Jews) 是当代以色列社会多元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它曾是以色列建国初期世界范围内阿里亚运动^②的主要来

* 杨玉龙，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东方犹太人”又称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一词在希伯来语中即为“东方的”之意。在以色列国内米兹拉希犹太人主要泛指来自中东、中亚、北非、高加索等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的犹太移民，诸如：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也门、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阿塞拜疆等。关于米兹拉希犹太人的适用范围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划分，有的学者认为它主要指称中东地区的犹太移民；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包括中亚、北非等地区的犹太人；甚至有人认为塞法尔迪犹太人也应当属于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一部分。

② “阿里亚运动” (Aliyah Movement) 是指“大流散”时期世界各地犹太人移民重返“圣地”以色列的移民运动。19 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阿里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与“阿里亚”相反，离开以色列被称之为“耶里达” (Yerida)。需要指出的是，阿里亚运动并非只属于历史性范畴，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仍有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民至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制定的《回归法》 (Law of Return) 为世界各地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提供了合法的移民法律文本。

源,也曾为巴勒斯坦伊舒夫^①(Yishuv)农业垦殖运动做出了历史贡献,缓解了以色列建国后农业劳动力和国防军兵源等人口资源短缺的困境,其中伊拉克犹太人社群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近年来,东方犹太人移民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对于研究以色列国家移民史和思考国际移民理论具体案例有较强的学术意义。东方犹太人社群在当代以色列政党政治和公共空间中具有相当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对这一群体的历史问题研究,有助于研究和反思以色列建国后的社会整合问题,以及理解当代以色列社会多元性和政治分层。对于伊拉克犹太人历史研究,目前国内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国内学界的关注点聚焦于东方犹太人群体对当代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角色,以及以色列社会整合的相关问题。^②国际学术界方面,对于伊拉克犹太人历史的相关问题研究包含了口述史的编纂整理,现代伊拉克犹太人历史,以及伊拉克犹太人历史中的专门性问题研究,诸如法胡德事件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研究、移民以色列的社会融合问题等。^③

一 伊拉克犹太社群社会地位的两次变化 (1921 ~ 1941)

伊拉克犹太人属于东方犹太人分支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至 2500 多年前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历史上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犹太人曾在“大流散”

-
- ① “伊舒夫”(Yishuv)一词来自现代希伯来语,原意为“定居”,其历史意涵为“以色列之地”(Land of Israel)犹太定居者社群,可意译为“巴勒斯坦犹太社群”或“巴勒斯坦伊舒夫”,通常指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作为历史范畴的“伊舒夫”,一般分为旧伊舒夫(Old Yishuv)和新伊舒夫(New Yishuv),旧伊舒夫指 1882 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阿里亚运动之前业已存在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群。本文所指的伊舒夫即后者。
- ② 王彦敏:《以色列政党政治框架下的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外国问题研究》2016 年第 3 期;李志芬:《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边缘族群:东方犹太人》,《世界民族》2015 年第 2 期。
- ③ Tamar Morad, Dennis Shasha, and Robertt Shasha Edited, *Iraq's Last Jews: Stories of Daily Life, Upheaval and Escape from the Modern Babyl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Orit Bashkin, *New Babylonians: A History of Jews in Modern Iraq*,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Zionism in an Arab Country: Jews in Iraq in the 1940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Group, 2004;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Magnes Press, 2010, Orit Bashkin, *Impossible Exodus: Iraqi Jews in Isra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时期对拉比犹太教及犹太律法文本《塔木德》做出过重要贡献。自阿巴斯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后，巴格达城市逐渐成为伊拉克地区犹太人社群的聚居中心，这一格局延续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伊拉克地区时期，犹太人社群以“迪米”身份受到伊斯兰教法保护，基本维持了社群集体安全和相对独立的社群自治地位。一方面，犹太人向政府缴纳人头税，政府有义务保护犹太人安全；另一方面，犹太人社群的内部事务实行自决，宗教信仰自由，犹太人可以从事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中低级行政事务等。至 1918 年奥斯曼帝国统治结束时，巴格达城市犹太社群居民约为 80000 人，占全城总人数的 40%，^① 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城市也有一定数量居民的犹太社区。

英国对伊拉克推行直接委任统治（1921 ~ 1932）时期，伊拉克犹太人社群进入整体发展的黄金时代，犹太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在伊拉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主要得益于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和费萨尔一世国王的友好政策，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利用传统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策略，以支持库尔德人、亚述人、基督徒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来牵制主体民族。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曾于 1919 年签署《费萨尔—魏兹曼协定》（Fasal-Weizmann Agreement），对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表示同情和理解。

政治方面，犹太人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王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多名犹太裔担任议会议员：沙逊·海斯卡尔（Sasson Heskell）曾担任财政部部长职务；大卫·萨姆拉（David Samra）曾履任上诉法院的副主席职务。犹太人凭借技术和语言优势，在邮传部、铁路等部门也多担任要职。^② 经济方面，犹太人主要从事银行业、对外贸易等，与南亚、东亚、欧洲等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贸易联系，对于伊拉克经济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教育方面，犹太人受到英国现代化教育的深刻影响，兴办西式学校，中产以上阶层积极出国留学；犹太人出版各种类型的新闻报刊，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较快的发展。

1933 年费萨尔一世国王去世后，受伊拉克国内外诸多方面的影响，犹

^① Tamar Morad, Dennis Shasha, and Robert Shasha Edited, *Iraq's Last Jews: Stories of Daily Life, Upheaval and Escape from the Modern Babylon*, p. 4.

^② Sadok H. Masliyah, "Zionism in Iraq,"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5, No. 2, 1999, p. 216.

太人在伊拉克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伊拉克对本国犹太人政策采取从友好政策逐渐转向为限制政策。其一,伊拉克政府改变了在政治上重用犹太人的政策,犹太人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位的数量急剧减少,政府的犹太裔雇员受到限制;其二,希伯来语教学在伊拉克国内中小学被逐步禁止;其三,限制公办院校的犹太教师和学生数量。1934~1937年,伊拉克国内已多次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抢劫、袭击或谋杀事件。^①这一时期,伊拉克犹太人被阿拉伯人视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同伴”,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反犹主义和反英国殖民主义视为一体化的政治话语,^②这一现实无疑助推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族际关系的张力。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伊拉克犹太人社群内部产生了国家认同转向,犹太民族认同与伊拉克国家认同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历史上的伊拉克犹太社群与阿拉伯人历经一千多年的族际交往和文化融合,语言文字、社会习俗、日常生活已经阿拉伯化,维系犹太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来自拉比犹太教的宗教认同。1882年以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兴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传入伊拉克,来自巴勒斯坦和欧洲地区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在伊拉克犹太社群内部宣传和动员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阿里亚运动,希伯来语复兴、弥赛亚观念宗教情感、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之家等宗教、文化和政治因素启蒙了伊拉克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观念,在犹太民族认同与伊拉克国家认同之间制造了难以消弭的矛盾,理想化的犹太国家观念萌生于伊拉克犹太人社群。

法胡德事件产生前,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尚处于自发性的小规模形态,缺乏组织性和规模性移民运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伊拉克国内政治形势较为稳定,偶发性和小规模的反犹主义事件尚未触动犹太人社群的根本利益和群体安全;虽然犹太人社会地位开始下降,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但其经济实力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犹太社群中仍首屈一指。其二,中东阿拉伯国家犹太社群未得到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的重视,阿里亚运动受到较大程度限制。30年代,犹太代办处对于阿里亚运动的关注重点聚焦于欧洲地区,对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只给

① Sadok H. Masliyah, "Zionism in Iraq," p. 216.

② Moshe Get,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Vol. 24, No. 3, p. 307.

予了少量的移民名额分配。就移民名额分配问题，伊拉克犹太社群认为犹太代办处刻意针对东方犹太人推行不平等政策。

二 法胡德事件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法胡德”（Al-Farhud）在伊拉克阿拉伯口语中有“抢劫”或“掠夺”之意，在犹太史语境下，它指发生于 1941 年 6 月 1~2 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的杀戮、伤害、抢劫犹太人及其商店、财产的恶性反犹主义暴力事件。^①

二战中的中东战场是法胡德事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1941 年欧洲战场形势对同盟国极为不利，伊拉克国内亲英派和亲德派势力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战争倒向轴心国的格局使亲德派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卜杜拉摄政王，施行亲德外交路线。4 月 1 日，政变在巴格达成功，阿卜杜拉流亡国外，拉希德·盖拉尼（Rashid Gaylani）建立国防政府，引发英国的军事干涉。

英伊战争进程成为法胡德事件的导火索。5 月底伊军战败，盖拉尼逃往伊朗。^② 战争失败导致受严重挫伤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士兵以及反犹民众将犹太人作为发泄对象。^③ 6 月 1 日，时值犹太教节日五旬节，一名前往伊拉克王宫会见摄政王阿卜杜拉的巴格达犹太代表在路上被杀，城中一些战败士兵、右翼青年成员、警察以及市民掀起屠杀犹太人、焚烧犹太人房屋及抢劫商店的暴乱。6 月 2 日，伊拉克内部安全委员会下令镇压暴徒，恢复城内秩序。据不完全统计，在持续两天的屠杀中，约 100 名犹太人被杀，数百人受伤，大约 15% 的巴格达犹太人受到波及，还有大量房屋和商店被焚烧。^④

第一，纳粹德国对伊拉克推行的反犹主义宣传对伊拉克国家政治稳定

① Orit Bashkin, *New Babylonians: A History of Jews in Modern Iraq*, p. 101.

② Jeffrey Herf,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1.

③ Reeva Spector Simon, Michael Menachem Laskier and Sara Riguer eds., *The Jew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50.

④ 关于法胡德事件的伤亡人数统计，沙米尔·莫里赫和列维·耶胡达认为有 160~180 人死亡；伊斯梅尔·格里辛斯坦因认为死亡人数为 150 多人，而斯塔西·E. 霍尔登认为死亡人数为 110 多人。

和族际关系产生破坏性张力效应，这是酿成法胡德事件重要的外部因素。二战时期的中东，纳粹德国在伊拉克的宣传鼓动对伊拉克社会中阿犹关系的影响异常显著，是伊拉克阿拉伯人产生反犹情绪的重要责任者。

二战爆发后，中东成为轴心国与同盟国争夺的重点地区。对英国而言，伊拉克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其一，伊拉克是其中东地区重要的石油供应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价值；其二，伊拉克是英联邦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属印度军队的运输通道；^①其三，伊拉克还是英帝国通往印度的第一要道，^②是拱卫英印地区的重要据点。纳粹德国充分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反英、反法情绪，将纳粹德国身份塑造为阿拉伯人的朋友，通过外交、经济、文化等方式削弱英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和英伊同盟关系，为自身战略利益和对外侵略扩张服务。

纳粹德国拉拢伊拉克的主要途径是外交攻势和反英反犹宣传的政策方针。首先，纳粹德国外交部和驻伊外交人员极力拉拢伊拉克政府上层官员和国王。希特勒政府甚至为伊拉克国王加齐颁发德国勋章，邀请伊拉克社会名流和亲德分子访问德国，宣传纳粹党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③纳粹德国在伊拉克进行反英反犹宣传的中心是德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弗里茨·格罗巴 (Fritz Grobba) 公使为中心人物。德国外交人员积极扶持亲德派政府官员，如伊拉克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核心人物阿明 (Amin)，他是穆桑拿俱乐部 (al-Muthanna Club) 的奠基人之一。富图瓦运动 (The Futuwwah Movement) 的主管人萨米·肖卡特 (Sami Shawkat)，他是典型的伊拉克法西斯分子和亲德派头目，曾多次访问纳粹德国，在伊拉克国内宣传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反英反犹言论；还有流亡在伊拉克巴格达的巴勒斯坦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也是亲德派和典型的反犹主义者，他曾在柏林接受希特勒接见，在伊拉克从事反犹思想宣传。

其次，纳粹德国通过报纸、书籍、电台等传播工具进行反犹反英宣传，激发了伊拉克军队部分军官和政府官员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效仿。弗里茨·格罗巴利用阿语报纸“阿拉姆·阿拉比” (al-Alam al-Arabi) 在伊拉

① Jeffrey Herf,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p. 60.

②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混乱时期的伊拉克 1930~1941》，北京师范大学伊拉克史翻译小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 2 页。

③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混乱时期的伊拉克 1930~1941》，第 214~215 页。

克进行反犹主义宣传，他把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翻译为阿拉伯语，^①向伊拉克阿拉伯人传播纳粹的意识形态。柏林电台也开通阿拉伯语频道，进一步加强对伊拉克社会的渗透力度。

二战爆发后，亲英派政府努里·赛义德宣布与德国断交，1940 年欧洲大陆有利于纳粹德国的战争形势使伊拉克国内亲德派逐渐占据上风。6 月，纳吉·肖卡特（Naji Shawkat）在安卡拉秘密会晤德国驻土耳其公使冯·巴本（Von Papen），商讨由纳粹德国支持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10 月 23 日，所谓的《德意宣言》公布，宣言里声称“轴心国”同情阿拉伯民族运动，“轴心国”对阿拉伯世界无侵略意图。

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政府宣布战败投降，希特勒政府意图将巴格达变成德国在近东的反英中心，以逐步摧毁英国在近东的影响，切断英国本土和英印之间的联系。德国政府在接管叙利亚的管理权后，进一步加强在伊拉克的影响和反英反犹宣传。伊拉克亲德派在纳粹德国支持下联合伊拉克军方的“金方阵”军官发动政变。之后英伊战争的失败使巴格达城陷入权力真空，反犹分子借机发起暴乱，掀起了屠杀和抢劫犹太人的风潮。

第二，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冲突问题的外溢影响加剧了伊拉克国内阿犹族际关系的紧张化，刺激了部分伊拉克阿拉伯人对本国犹太人的仇恨心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认同使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冲突问题超越国界，引起伊拉克阿拉伯人反犹主义的思潮。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 - 犹太民族冲突问题，主要源于英国统治政策和社会资源分配张力。

30 年代，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使后者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该地区的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自《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在巴勒斯坦推行亲犹政策，犹太移民凭借着经济优势和知识技术，获取了许多土地和就业机会，社会资源平衡的破坏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利益受到损害，巴勒斯坦人的反英反犹情绪日益高涨。1929 年以及 1936 ~ 1939 年，巴勒斯坦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反英起义，给予英国委任统治沉重打击。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伊拉克基于泛阿拉伯民族认同而产生强烈反应。1940 年 7 月，伊拉克政府向英国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被英国

^① Moshe Gat,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p. 308.

首相丘吉尔断然拒绝。

随着巴勒斯坦问题不断恶化,伊拉克社会对本国犹太人态度迅速转变,使伊拉克犹太社团的处境愈加艰难。^① 1941 年 7 月,马帕伊领导人摩西·夏里特在开罗与流亡埃及的伊拉克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曾有过一次会晤,谈到法胡德事件时,努里·赛义德认为,无论是法胡德事件还是拉希德·盖拉尼政变,都是由巴勒斯坦问题所引发。^② 由此可见,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冲突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

第三,伊拉克国家政治不稳定为反犹主义暴乱提供了政治真空期。30 年代初,伊拉克实现了国家独立,而英国通过联盟条约保留了对伊拉克的特殊存在。新生的伊拉克国家缺乏政治稳定机制和国家治理能力,国内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冲突和民族教派关系。

三四十年代伊拉克政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稳定性和派系分化的冲突性。伊拉克实际掌权者是性格软弱的摄政王阿卜杜拉,统治阶层由于政治观点分歧而分裂。在政治倾向和对外关系方面,以摄政王阿卜杜拉为代表的温和泛阿拉伯主义派主张积极与英国合作,以盖拉尼和军队中的“金方阵”为代表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派要求与英国决裂,向轴心国德国靠拢。政治分裂与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 1936~1941 年发生 7 场政变,^③ 其中以 1941 年 4 月 2 日由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及伊拉克军方高层指挥官发动的反摄政王的军事政变影响和破坏力最大。盖拉尼政变导致英伊战争的爆发,进而使 5 月末的巴格达城陷入无政府状态。它破坏了巴格达社会秩序,给予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战败士兵以发动袭击的时机,失序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对犹太人群体安全的威胁。

第四,伊拉克国家对犹政策的限制与排斥转向助长了反犹主义思潮的发展。30 年代中期以后,伊拉克国家的犹太政策从宽容转向限制与排斥策略,伊拉克各地犹太社群的处境逐渐恶化,反犹、排犹示威游行和暴力袭

① Stacy E. Holde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Modern Iraq*,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12, pp. 114 - 115.

② Esther Meir-Glitzstein, "The Baghdad Pogrom and Zionsit Policy," in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p. 194.

③ Hayyim J. Cohen, "The Anti-Jewish Farhud in Baghdad, 1941," in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p. 163.

击事件时有发生，群体安全困境逐渐凸显。1936 年，巴勒斯坦地区爆发针对犹太人的“阿拉伯大起义”（Arab Revolt），事态迅速发展引起伊拉克社会强烈反应，伊拉克犹太人安全处境开始恶化。1936~1939 年，10 名犹太人被杀，有 8 次针对巴格达犹太人学校、俱乐部和犹太会堂的炸弹袭击。^①面对巴格达等城市危险的安全局势，阿拉伯人要求犹太人发布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国际犹太人无任何联系的正式宣言，为了平息伊拉克国内反犹情绪，巴格达大拉比（Chief Rabbi）宣布伊拉克犹太人不支持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②

法胡德事件结束后，伊拉克政府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进行责任认定。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巴格达市警察局局长、当地驻军司令以及内务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成员是主要责任人。

第五，英国在中东地区对犹太人政策的更新及其“扶阿抑犹”策略是法胡德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在伊拉克的特殊存在使其拥有阻止惨剧发生的能力与条件，但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法胡德事件没有采取及时的军事介入。从一战期间占领伊拉克到 1932 年允许伊拉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英国对伊拉克实施了 10 余年的直接统治。1932 年以后，英国依靠 1930 年签署的《英伊同盟条约》实现了对伊拉克的间接统治和影响。根据该同盟条约，英国在伊拉克保留大量政治、军事特权。在军事方面，同盟条约规定：伊拉克军队须聘用英国教官；战争爆发时两国属军事同盟的互助关系；伊拉克陆海空战时为英国军队开放；英国在巴士拉和巴格达保留军事基地；英国军队各兵种可在伊拉克领土调动。^③

法胡德事件爆发时，英国军队距离巴格达城咫尺之遥，屠杀和暴乱在城中爆发和蔓延时，英国驻伊拉克大使康恩沃里斯（Cornwallis）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任由事件恶化。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对该事件和英国政府的行为做出了自己的评析。

1941 年 7 月 9 日，马帕伊（Mapai）中央委员会召开政策会议时，摩

① Moshe Gat,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p. 309.

② Reeva Spector Simon, *Iraq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③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 189 页。

西·夏里特 (Moshe Sharett) 提出了关于未来政策的两点看法。首先, 阿拉伯世界犹太社团的处境正在不断恶化, 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步步逼近下处于危险。其次, 英国政府及其军队对巴格达城中两天的骚乱屠杀毫无干预, 英国很难再保证中东地区犹太人的生命安全。战后, 英国政府在解释为何未能使用军事手段阻止惨剧的发生时, 声称根据 1930 年的《英伊同盟条约》, 英国军队不应进入巴格达干预其内部事务。英国政府的理由显然无法解释英国 1945 年在利比亚和 1947 年在亚丁为何使用军事手段压制了反犹排犹的暴力事件。^① 真实原因是英国政府极力想与伊拉克政府和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而军队进入巴格达很可能导致英伊关系的破裂, 因此英国对法胡德事件置之不理。

第六, 伊拉克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思潮的泛起是法胡德事件产生的内在根源。1932 年独立后, 伊拉克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英国殖民势力特殊存在的刺激和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冲突的影响, 使一些民族主义者滑向极端民族主义, 政府和社会中创建了一些准军事性质或民族主义旗帜的组织。伊拉克军队中以“金方阵” (Golden Square) 四人为代表的军官持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支持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 试图摆脱英国的特殊存在, 倒向纳粹德国, 导致拉希德·阿里政变和国内局势混乱。

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富图瓦运动的政治行动。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命令时任教育部大臣萨米·夏卡特发起富图瓦运动, 它是由初高中学生组成、由政府直接管理的青年学生运动。富图瓦学生要接受统一的准军事训练, 学生教育的军事精神以纳粹德国为模板, 成员多达 63000 多人。^② 作为反英亲德的产物, 富图瓦运动与德国纳粹党的希特勒青年团来往密切。1937 年, 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冯·希拉赫 (Von Schirach) 曾访问伊拉克, 对富图瓦运动给予高度评价, 富图瓦代表于 1938 年参加纽伦堡希特勒青年团党代会。^③

① Hayyim J. Cohen, "The Anti-Jewish Farhud in Baghdad, 1941," in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p. 169.

② Stefan Wil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Arab Near East, 1936 - 1939," in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p. 35.

③ 乔治·柯克:《国际事务概览·战时中东》(1939 - 1946),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第 96 页。

三 法胡德事件的影响及二战后的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

1941 年法胡德事件成为伊拉克犹太人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迅速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伊拉克犹太社群中得到了响应和支持，而巴勒斯坦伊舒夫逐步调整了对东方犹太人问题的消极政策，积极介入阿拉伯国家犹太人阿里亚运动，犹太人的伊拉克国家认同观念被彻底动摇。

（一）法胡德事件对伊拉克犹太人社群的多重影响

第一，法胡德事件推动了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形态。虽然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可追溯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但移民绝对数量很小。法胡德事件爆发后，犹太代办处决定增加伊拉克犹太人移民许可证数量，当年有数百名伊拉克犹太人在犹太代办处移民部帮助下移民巴勒斯坦。^①

相较二三十年代自发性阿里亚运动，法胡德事件之后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表现出规模性和组织性两个特征。其一，就移民人数绝对数量而论，40 年代阿里亚运动不再是零散性、自发性的小规模移民行为。其二，1941 年后的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表现出组织性特征，一是巴勒斯坦伊舒夫及其犹太代办处对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的主动介入，组织和动员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二是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卢茨运动等积极宣传和动员犹太人。

法胡德事件对于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的刺激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安全层面。自 20 世纪 30 年中东地区阿犹族际关系趋于恶化后，犹太人在阿拉伯国家的人身安全持续恶化，反犹主义暴力事件陆续产生。法胡德事件是伊拉克反犹主义思潮的一次集中爆发，也是伊拉克犹太人社群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的动机以安全因素为主导，宗教、民族、政治等其他因素是次要性影响，对于已生活在阿拉伯世界上千年的伊

^① Esther Meir-Glitzstein, "The Baghdad Pogrom and Zionsit Policy," in *Al-Farhud: The 1941 Pogrom in Iraq*, Shmuel Moreh and Zvi Yehuda ed., p. 186.

拉克犹太人而言,其族群文化已高度阿拉伯化和本土化,犹太教宗教信仰在这一时期并不构成伊拉克犹太人实现其回归圣地的主要心理情感倾向,而犹太复国主义等政治民族主义的动员也难以得到伊拉克犹太人的支持。然而,法胡德事件前后安全环境的持续性恶化,使伊拉克犹太人社群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反犹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推力迫使部分伊拉克犹太人移民海外,而巴勒斯坦是当时犹太人选择移民的理想地区。当然,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传入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伊舒夫政策的改变,东方犹太人问题日益受到巴勒斯坦伊舒夫在人口战略层面的重视。

第二,法胡德事件改变了伊拉克犹太社群与巴勒斯坦伊舒夫的相对疏离关系,伊舒夫开始将中东阿拉伯国家犹太社群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建设未来犹太国家的发展重点。1941年前,伊舒夫和国际性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很少关注伊拉克犹太社群,相互联系也仅限于一定范围的文化、经贸等关系。当时伊舒夫和国际性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关注重点是生存处境已极为艰难的中东欧数百万犹太人,他们是伊舒夫推行阿里亚运动和分配移民许可证优先考虑的对象。法胡德事件爆发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之一的本-古里安在比特摩尔决议(Biltmore Resolution)通过“百万计划”(One Million Plan)^①的移民战略规划,要求伊舒夫将中东北非的80万犹太人移民至犹太人口数量不足的巴勒斯坦,^②为建立未来的犹太国家奠定人口基础,以劳动力替代战略平衡阿犹两族在巴勒斯坦的人口对比。

法胡德事件后不久,马帕伊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伊拉克采取行动,帮助当地的犹太人。巴勒斯坦锡安主义运动对伊拉克犹太社团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犹太代办处移民部主动派人员前往巴格达、巴士拉等伊拉克城市,帮助和鼓动当地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这是基于安全因素和壮大自身实力的考量;其二,巴勒斯坦犹太人募捐资金援助遭遇巨大损失的巴格达犹太人,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生活;其三,锡安主

① 该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由本-古里安开始构思,40年代初正式提出,其目的是充实巴勒斯坦伊舒夫的犹太人口,其人口来源最早的设想是欧洲犹太人,但随着纳粹开始大规模屠犹而进一步提出从伊斯兰世界吸纳东方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法胡德事件后,伊舒夫已意识到阿拉伯世界犹太社团的潜在危险和对建设未来犹太国家的重要意义。

②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Zionism in an Arab Country: Jews in Iraq in the 1940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Group, 2004, pp. 35-40.

义组织在伊拉克进行锡安主义教育与宣传工作，促使当地锡安主义运动觉醒。

第三，法胡德事件损害了伊拉克犹太人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观念，伊拉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族际关系面临危机。法胡德事件使许多伊拉克犹太人认识到所谓的“伊拉克化”族群融合策略的失败，犹太人哀叹：“犹太人是犹太人，而非伊拉克人。”^① 法胡德事件后，虽然伊拉克政府给予受害者 20000 第纳尔赔偿金，也难以改变伊拉克犹太人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安全缺失的状态，^② 实际上反映了犹太人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观念的动摇。

持续两天的反犹主义屠杀给伊拉克犹太人内心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创伤。犹太人对屠杀的恐惧令他们不再相信伊拉克政府，阿拉伯人也因巴勒斯坦问题拒绝将犹太人视为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阿拉伯-犹太族际关系至 1948 年已处于破裂境地。二战结束后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更激烈的反犹主义思潮，巴格达、巴士拉等城市的犹太社团处于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③

第四，法胡德事件刺激了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犹太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得到伊拉克犹太青年的支持和参与。法胡德暴乱平息后，当年 7 月部分犹太青年组建“青年救援组织”（Youth Rescue Organization, YRO），该组织筹集资金和购买武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宣传和动员犹太复国主义思想。1942 年，“自由犹太人社群”（Free Jewish Community, FJC）组织建立，其主要活动是教授希伯来语，保护伊拉克犹太人社群，鼓励犹太人参与阿里亚运动。^④ 巴勒斯坦伊舒夫转变对东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后，也积极参与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主要目标是推广希伯来语教学，扶持哈卢茨运动^⑤（Halutz Movement），促进阿里亚运动，以及建立军事特征的哈加纳组织（Haganah）。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的哈卢茨运动发展至

① Moshe Gat,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p. 310.

②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Zionism in an Arab Country: Jews in Iraq in the 1940s*, p. 11.

③ Stacy E. Holde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Modern Iraq*, p. 114.

④ Sadok H. Masliyah, “Zionism in Iraq,” p. 222.

⑤ “哈卢茨运动”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开拓运动”（Pioneering Zionist Youth Movements, PZYM）的分支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对犹太青年进行技能培训，鼓励其前往以色列参与农业垦殖活动。“哈卢茨”（Halutz）希伯来语即意为“拓荒”。

40 年代末,已在伊拉克全国建立了 16 个分支组织,成员达到 2000 多人。^①

(二) 以色列的国家移民战略、阿里亚运动与伊拉克犹太人社群的终结

法胡德事件引起了伊拉克犹太人在战后更大规模和数量的移民活动,直至伊拉克犹太人社群的终结。就移民动因而论,以色列国及其雏形时期的伊舒夫的移民战略及政策,是从外部对伊拉克犹太人形成的重要拉力,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人口战略考量。

其一,犹太人劳动力替代战略。1922 年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后,根据巴勒斯坦可接纳人口能力的条件适当地给予巴勒斯坦伊舒夫一定数量的劳工许可证,以劳动力形式吸收世界犹太人社群移民,完成对建设犹太民族之家的许诺。巴勒斯坦伊舒夫移民战略之一是增强犹太人定居点工农业建设能力,特别是要弥补农业垦殖运动对劳动力较大的需求缺口。由于 20 年代初巴勒斯坦犹太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犹太人农业发展不得不雇佣阿拉伯农民,这一现实不利于伊舒夫的总体发展。由此,伊舒夫制定了劳动力替代战略,通过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吸引犹太人劳动力,替代阿拉伯劳工,满足工农业发展需要。

其二,扩大巴勒斯坦伊舒夫规模,为建设未来独立的犹太国家奠定人口和领土基础。伊舒夫制定的移民战略首先服务于农业垦殖运动和扩大农业定居点,其长远战略目标是构建独立的犹太国家夯实人口与领土基础。英国对巴勒斯坦推行委任统治制度后,伊舒夫的犹太人口规模和农业定居点数量依然无法与巴勒斯坦地区民族结构占主体地位的阿拉伯人相比。尽管英国政府给予了犹太民族之家的许诺并制定了劳工移民政策,但劳工移民数量不能满足世界犹太人社群对移民巴勒斯坦的申请数量。特别是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和巴勒斯坦内部阿犹族际关系平衡开始失序后,伊舒夫内部开始为建立未来的独立国家制定移民战略。

1948 年 5 月建国后,以色列延续了先前的人口移民战略。旨在推动伊拉克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的国家移民行动,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方移民行为,其背后有以色列国家人口战略的深层

^① Sadok H. Masliyah, "Zionism in Iraq," p. 223.

政治意图。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后，本 - 古里安政府仍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困境，对外受阿拉伯国家敌视和包围；从以色列国内部来看，犹太民族的人口严重不足，经历二战期间纳粹屠犹后，欧洲犹太人损失 600 万人，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犹太人被禁止大规模移民以色列，本 - 古里安政府充实以色列犹太人口的最优途径是吸纳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东方犹太人。吸纳伊拉克犹太人为新生的以色列国补充了重要的人口，满足了建国初期许多方面的建设工作。充沛的伊拉克犹太青年男性是以色列建国后国防军建设不可或缺的兵源，与建国初期战争环境直接相联系。从长远人口平衡战略而论，以色列国内部仍有大量阿拉伯人口，强化犹太移民政策，鼓励或直接实施阿里亚运动，逐步改变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的人口比例，有助于以色列国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强化国家的犹太民族性。本 - 古里安政府的人口战略被称为“百万人口战略”，从 1948 年建国至 1951 年，以色列政府人口容纳战略使全国犹太人口增加了一倍。^①

对于伊拉克国家而言，驱逐国内犹太人是解决国内犹太人问题的最佳方案之一。二战结束后，伊拉克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保卫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权益的情绪更趋强烈，政府对犹政策全面转向。1948 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伊拉克战败等因素导致伊拉克反犹主义再次高涨，伊拉克政府决心以强制方式将犹太人驱逐至以色列。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建国及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将犹太人推向了伊拉克社会对立面。伊拉克政府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② 1948 年 5 ~ 8 月，300 名犹太人被伊拉克政府以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由拘捕。^③ 9 月 23 日，伊拉克犹太商人沙菲克·阿戴斯被伊拉克法庭以私运武器给以色列和支持伊拉克共产党的罪名判处死刑，家产被没收，该事件给予伊拉克犹太社群极大震动。^④

1949 年，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向英国和联合国代表提出“人口交

①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3, 2011, p. 150.

② Ya'akov Meron,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 Arab Countries: The Palestinians' Attitude Towards It and Their Claims," in *The Forgotten Millions: The Modern 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 ed. Malka Hillel Shulewitz,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Press, 1999, p. 87.

③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Zionism in an Arab Country: Jews in Iraq in the 1940s*, p. 162.

④ Orit Bashkin, *New Babylonians: A History of Jews in Modern Iraq*, p. 90.

换计划”(Exchange of Populations Plan)。^① 努里·赛义德的人口交换计划未能得到联合国和英国支持,伊拉克政府决心以法律形式颁布驱逐法令将 10 万犹太人逐出伊拉克。

1951 年伊拉克政府颁布的《国籍放弃法》标志着官方制定的驱逐犹太人政策正式出台。《国籍放弃法》是伊拉克内政部部长萨利赫·贾巴尔向伊拉克议会提交的法案,目的是以合法方式驱逐犹太人出境,剥夺犹太人的伊拉克国籍权利,消灭国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法案颁布后,约 8.6 万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国籍移民以色列。^② 3 月,伊拉克政府颁布“财产冻结法令”,没有及时放弃国籍移民的伊拉克犹太人被迫以损失几乎所有财产的方式移民以色列。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起“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的国家移民行动,将其余 10 万伊拉克犹太人接纳回以色列国内。至此,伊拉克犹太人阿里亚运动基本结束,而移民以色列后的伊拉克犹太人面临着艰难的生活条件和社会融合过程。

结 语

伊拉克国家建立后,犹太人主动尝试融入伊拉克社会,试图成为具有伊拉克国家认同的阿拉伯人犹太教徒。然而,纳粹德国对伊拉克推行的反犹主义宣传与动员,英国对阻止法胡德暴乱的消极应对,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民族冲突问题,伊拉克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及其对犹政策的变化,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起等因素引起反犹主义的法胡德事件,从此阿拉伯-犹太族际关系日趋恶化。法胡德事件对伊拉克犹太人形成了深远影响,成为伊拉克犹太人历史性的转折点。法胡德事件引发犹太人对自身群体安全的高度焦虑,规模性和组织性的阿里亚运动因之而起。它改变了伊拉克犹太社群与巴勒斯坦伊舒夫的疏离关系,使后者开始将移民战略和建立犹太国家的重点投入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群;它还引起伊拉克犹太复国

① Ya'akov Meron,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 Arab Countries: The Palestinians' Attitude Towards It and Their Claims," in *The Forgotten Millions: The Modern 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 Malka Hillel Shulewitz ed., p. 88.

② 杨玉龙、李琦:《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多维历史透视》,《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哈卢茨运动成为推动阿里亚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最后，法胡德事件动摇了犹太人的伊拉克国家认同观念，使伊拉克犹太人更快地转向犹太民族主义思潮。

法胡德事件本质上反映了犹太人与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整合趋向失败，伊拉克阿拉伯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心态和反犹主义思潮彻底瓦解了犹太人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观念。面对日益恶化的群体安全和反犹主义思潮，伊拉克犹太人不得不选择阿里亚运动，以集体性移民方式换取群体安全，被动地融入以色列国家与社会。

本文认为，1941 年法胡德事件是 20 世纪前期中东地区阿拉伯 - 犹太族际关系危机的缩影，是历史考察阿拉伯 - 犹太族际关系发展演变的重要案例。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中东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也门、埃及、叙利亚等先后爆发了反犹主义事件或强制驱逐犹太人的历史现象。解构法胡德事件的历史根源和影响对研究二战后中东地区阿拉伯 - 犹太族际关系的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是我们研究和分析当代以色列社会东方犹太人群体问题的历史起点。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东方犹太人社群，还面临着艰难的社会整合挑战。以色列国建立后，民族建构意识形态以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 Jews）的欧洲犹太文化为主流，东方犹太人的多元文化性面临着被主流社会文化稀释的挑战；东方犹太人通过社会运动追求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由此产生了东方犹太人移民问题（Oriental Jewish Immigrant Question）。^①

[责任编辑：申玉辉]

^① Avi Bareli, "Mapai and the Oriental Jewish Ques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tate,"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6, No. 1, 2009, p. 55.